

己群之际：民众社会心态影响政府评价的多重机制解析*

许博洋 周 由 王俊秀**

【摘 要】民众对政府的评价既反映出政府对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实际满足情况,也受到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效果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影响政府评价的“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通过对 CSS 数据分析后发现,社会心态元素系统会以“上行反映”与“下行释放”的中介方式作用于个体生活经历影响政府评价的过程;相较于强调主观“表达性”色彩的社会信任与社会道德,能够折射公权力“功能性”内核的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在中介机制中具有更高权重;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感知在模型中具有协同性调节功能。研究发现对于政府感知民情民意具有启发意义,也为推进基于社会心态的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政府评价;社会心态;个体生活;社会阶层;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权力的一切和平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洛克,2016),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切的恒常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

* 本文受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维民众感知的涉舆型犯罪治理效能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4CFX09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1JZD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4 年度中国政法大学新入校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10824904)的资助。

** 许博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周由,莫纳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讲师;王俊秀(通信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casswjx@163.com。

引文格式:许博洋,周由,王俊秀. 2025. 己群之际:民众社会心态影响政府评价的多重机制解析[J]. 公共管理评论,7(3):116-141.

Cite this article: Xu B Y, Zhou y, Wang J X. 2025.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public: The multiple social mentality mechanisms affecting government evaluations[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3): 116-141. (in Chinese)

代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建立政府与民众间的联结机制构成了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毋庸置疑,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与战略是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参与、社会协同、回应负责、开放透明、遵循法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上的(张成福,2023)。因此,民众积极的政府评价能够反映其对于国家的信任、信心和支持程度,这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目标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我国正处于矛盾日趋多元化的转型时期,群体层面的负面社会心理特征偶有涌现,无形中加剧了当下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如果人们的生活掌控感持续降低,累积风险将会突破社会心理负荷的临界点,诱发社会失范现象,破坏社会安宁。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兼备“社会转型的折射”与“社会转型推动力”的双重作用,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靶向指标(王俊秀,2014)。积极的社会心态能够有效抑制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各类潜在社会风险,而消极的社会心态则反映出亟待解决的潜在社会问题。因此,基于社会心态的社会治理,能够助推政府主体在体察民情民意、捕捉社会反馈、回应民众关切等方面实现效能优化。

本文旨在作出以下贡献。第一,植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需求与文化语境,构建基于多重机制实现政府评价形塑的“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第二,整合、丰富传统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应用场景,提出以“信任-道德-公平-安全”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心态元素系统及路径机制,探索其之于社会治理效能优化的实现方案;第三,剖析政府评价归因过程中的主客观阶层差异问题,为核心理论框架的实际应用提供锚点式指引;第四,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自定义 Process 模型与多项式曲面拟合技术(PCSF)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特定假设检验,为未来学界在分析复杂现象规律时提供方法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参与活动会自发地衍生出“政府行为-公民体验”的“双轮模式”,即政府在履行职能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公民的公共服务体验,而政府评价即为体验的一种必然性结果(张书维和李纾,2018)。在“双轮模式”下,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可以抽象概括为三类元件,即“政府单元”(大轮盘)、“公众单元”(小轮盘)以及“互动机制”(链条)。研究表明,公共服务供给(范柏乃和金洁,2016)、政府架构层级(吕书鹏,2015)、政府效率(陈刚和李树,2012)等“政府单元”能够显著影响政府评价。“公众单元”则关注生活满意度(裴志军和陶思佳,2018)、社会态度(瞿小敏等,2021)、文化心理(吴结兵等,2016)等特征的作用方式。“互动机制”考

察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行为或事件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常涉及接触经历(张友浪和朱旭峰,2020)、政治参与(魏万青,2016)、政务沟通(芮国强和宋典,2015)等变量。

整体而言,当前政府评价文献中概念割裂化与测量单一化特征明显,缺乏对于政府评价影响因素的整合性审视。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趋势之下,兼顾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诉求,回应时代提出的社会治理新要求、新课题,已然成为体现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应然成分。因此,如何适恰地耦合“政府单元”“公众单元”与“互动机制”框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指引下挖掘“个体—政府”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多重机制,对当下政府管理研究趋于饱和局面的突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 社会心态及其核心范畴:“信任—道德—公平—安全”

社会心态可以普遍被认为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杨宜音,2006)。社会转型时期,压力与矛盾的内化过程会涉及具有社会比较属性的价值判断(Festinger, 1954),该项复杂的认知加工环节必然会引发个体多种社会心态的波动,并影响后续的态度、行为倾向及社会选择。然而,学界在探讨社会心态时习惯于框定单一元素,人为地忽略了多维社会心态的前因与后果。追本溯源,“守诚信、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的精神特质,构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张波,2023)。现代化公共管理理念除了应当保持“社会样态秩序”的客观稳定度以外,自然更需兼顾人们“社会心态秩序”的主观完满性。而基层社会单元的心态秩序建设就是要在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保证多元领域的公平感体验与人际信任水平的高位,并促进城市安全感与传统道德感的协同性提升(王俊秀等,2023a)。那么,内涵上分别呼应“诚信”“仁爱”“正义”“和合”的信任感、道德感、公平感、安全感,便构成了政府部门依法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关键着眼点,更彰显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基于此,本文首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涵盖“信任—道德—公平—安全”四项核心范畴的社会心态元素系统,以期能够体现出我国民众朴素价值追求的集体效能和人本期待,并为学界深入理解公众与政府的关系提供具有高阶理论层次的模型建构逻辑。

社会心态元素系统在内部共演关系的基础上亦分饰了具有差异性功能的角色。其一,在信息获取成本高昂的互动环境中,社会信任的塑造受到遵循“经验法则”的决策环节影响(Nunn and Wantchekon, 2011)。碍于尊严与面子,个体习惯于依据经验判断选择限缩社会信任范围(亲属或熟人)以寻求即时共情,降低对于相关信息难以获取的陌生群体信任度,进而投射至政治体系以使政府信任的形式“重生”(张会芸,2017)。所以,由生活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信任下降,将恶化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知,徒增政治运作的阻碍。其二,社会道德感会通过秩序建构的方式在微观层面作用于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何哲,2023)。一个善治的社会和文明必然暗含着良性的道德秩序。政府肩负着社会运转的维护责任,其行为本身的是非曲直会对人们的道德认同产生示范效果。在难以扭转或救济无望的结构性压力面前,人们的规范意识与法治信仰会因社会比较而发生削弱,社会道德感的衰败会进一步反噬

社会运转中秩序维护的责任者。其三,“不患寡而患不均”,倘若公权力失范导致个体对社会公平产生怀疑,相对剥夺体验便会在社会层面弥散开来。诚然,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旨在实现权利均等的公共服务政策来提升社会公平感,但那些由自身压力所激起的负向心境,会引发民众对执法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的联想,使承担“主持公道”责任的政府部门出现公信力滑坡(Jost and Kay, 2010)。其四,社会安全感是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运行机制稳定程度的标志(许博洋和张纯琍, 2022)。转型时期社会的有序变迁和平稳运转构成了人们的共同愿景,然而犯罪、失业、环境恶化等负向事件会使本源的“心安”期待发生损耗。这种个体境遇所引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将不可避免地给旨在保障人民安居与生活安宁的政府主体造成信任危机。

(三) 社会心态的中介机理:“上行反映”与“下行释放”

社会心态常表现出由“己”至“群”的社会认知序列与社会表征过程,因此居民的生活状况自然会成为形塑政府评价的源头性因素。受消费者思维的驱使,个体会习惯性地消极生活境遇归咎于政府“消费满足”或“商品提供”职能的衰败(Oliver, 1980),并寻求第三方或更大规模的舆论监督。这映射出了公众对于公共价值的正当权衡,即追求个体权利与政府责任相统一的工具型价值观(效率、公开、规范等),以及追求生活状况与政府反馈相契合的情感型价值观(以人为本、利他导向等)。两种公共价值观念会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行政接触的广泛场景中,从而表现为个体和政府间的纽带联结与思维反刍过程。然而,在面对被舆论浪潮裹挟的公共事件时,政府机关的常规化治理举措常陷入评价失真的被动局面。数智时代的政府行为迫切需要一种覆盖社会整体的“情绪稳态”维持机制,以便使治理机关能够及时激发城市心理韧性。申言之,若要解决传统治理模式之于社会心态层面的机制失灵、力量失衡、表达失序等时代挑战,受民意本位理念影响的政府管理思维该如何转向?伴随民众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如何精准把握社会心态之于政府服务过程中的应用策略、流程节点与辐射范围?基于此,笔者提出一种能够应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公共管理领域的“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以便为政府主体提供蕴含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内核的心态均衡方略。

公共问题源于个体需求的溢出,即从人的行为逻辑来看,一切所作所为皆是为了满足需求。当需求超出个体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时,无法解决的部分即为需求的溢出,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指出,人们会对某一事件的原因产生差异化感知,并尝试从内部(internal)和外部(external)进行两种不同方式的归因(Kelley and Michela, 1980)。例如,个体可将生活压力内归因于个人因素(如性格习惯、努力程度、学历水平),或外归因于情景因素(如家庭背景、工作环境、资源分配)。当某一刺激具有外部性、持续性及不可控性的特征时,个体倾向于进行外部归因;反之,若刺激具备相反特征(如源于自身、短暂存在、易于把控),则会出现内部归因(Weiner, 1985)。在社会学习、社会参照和情感传染等社会互动机制的作用下,

个体可对共同事件进行信息分享与比对,习得他人对于事件的定义,内化他人对于事件的同步反馈(Hatfield et al., 1993),继而形成高度一致性的社会心态。最终,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如羞愧或愤怒),进一步引发差异性的归因结果(如自我修正或批评责备)。

当然,在自身境遇发生变化后,并非所有的个体都会主动采取外部归因的方式将生活体验感过渡至政府评价。此时,社会心态在个体和政府之间便起到了关键作用,和而不同的个体相互依赖,形成一种嵌套于“集体主义”文化导向下的普适心境。发达的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极大地缩减了个体之间的互动距离与信息交换成本,倘若个体发现生活压力是以群体性的方式跨时间、跨地域、跨阶层持续且不可控地存在时,便会形成相对消极的社会心态状况,致使人们聚敛性地采取外部归因方式,将境遇改变归咎于结构组织的代表——政府。由此,社会心态即构成了衔接客观事件与主观归因结果的桥梁式因素,蕴含了“上行反映”与“下行释放”的中介作用。“上行反映”路径揭示出由个体心理状态到群体社会心态的发展过程。微观的生活需求失衡会通过社会学习、社会参照和情感传染上行至社会心态层面,反映为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的损耗、社会信任与社会道德感的滑坡。“下行释放”路径指的是基于社会心态形成对政府责任的归因。当结构性压力普遍上升时,群体更易形成消极的社会心态并归因于政府的失责。社会心态作为一项群体层面的叠加型变量,其“上行反映”的动力会诱发出消极情绪能量的“下行释放”后果,形成由“社会评价”至“政府评价”的具象。

不难发现,社会心态不仅有助于行政主体理顺公共服务与民意动态间的复杂关系,更能够为行政主体对于社会治理政策修订树立“风向标”。实证方面,既有文献多聚焦于“个体生活—政府评价”路径,常基于期望失验理论(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或归因理论的局部观点验证房价上涨(陈伟和吴晓刚,2020)、失业遭遇(王晓莹和罗教讲,2016)、环境污染(邓明和仇勇,2018)等个体生活变量对于政府评价的直接影响,或零星化探讨单一社会心态变量的解释情况(赵建国和于晓宇,2017;郑姗姗和王浦劬,2022)。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社会心态之于个体和政府间关系的系统性动力机制,一些关键概念的作用机理、影响权重依然较为模糊。综上,为全面优化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效能,基于“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个体的生活状况对政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H2: 个体的生活状况对社会心态(社会信任、社会道德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

H3: 社会心态(社会信任、社会道德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对政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四)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评价缓释”与“评价强化”机制

作为决定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社会阶层自然构成了政府服务

与政策导向区分度的现实依据。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存在社会资源的接触差异与主观感知差异,表现为对于社会外部力量的依赖风格分化(Kraus et al., 2012)。高阶层个体因为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地位,更容易形成唯我主义认知倾向;而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则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思维导向,即更希望依赖于群体的力量与声音。此外,处于高阶层的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理想角色较为一致,更希望社会权力体系的稳定运转(Sidanius et al., 2003)。相较于低阶层者,高阶层者在社会程序公正时感知到的政府权威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更高。例如,收入较高的个体,丰富的社会资源使其具备更高的风险抵御能力,可能会“缓释”生活状况经由社会心态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影响;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在批判思维的主导下形成外部归因风格,“强化”生活状况经由社会心态对政府的消极评价,但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又可能会减弱社会心态对政府评价的感染力。学界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感知可以被视为社会阶层在社会认知视角下客观和主观方面的两种普遍性测量方式(胡小勇等, 2014),但既有研究尚缺乏考察二者在个体生活、社会心态对政府评价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因此,为初步检视中介模型的群体异质性,我们探索性地将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感知作为可能具有“评价缓释”或“评价强化”效果的社会阶层指标,并提出以下两项假设。

H4a: 社会阶层在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H4b: 社会阶层在社会心态对政府评价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依据上述逻辑,本文的假设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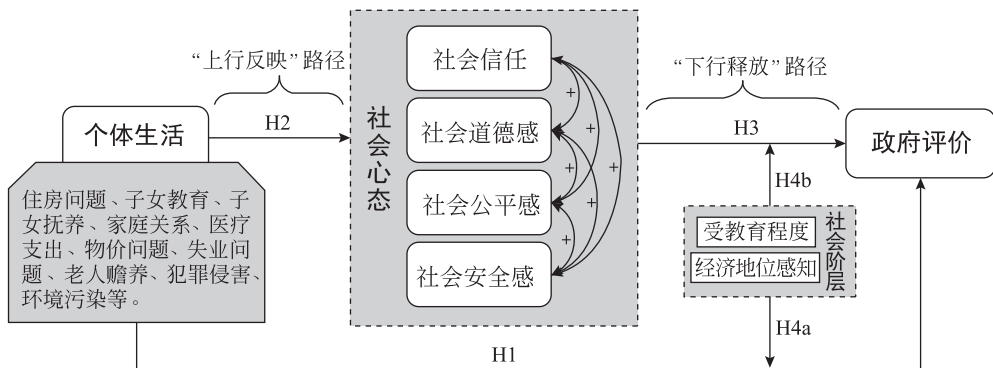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假设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该调查项目覆盖中国31个省级区域(自治

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调查对象为 18—70 周岁的中国公民,回收有效问卷 10136 份。调查涵盖了家庭、就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社会价值观、社会评价、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等模块。在剔除研究所关注变量的缺失值个案后,本文最终采纳的有效问卷共计 7482 份。

(二)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首先,运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差异性检验。其次,通过 Mplus8.0 软件运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分别进行基于显变量(Observed Variable)和潜变量(Latent Variable)模式下中介效应检验。参数估计选取极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并结合 Bootstrap 技术进行路径分析,以降低样本分布非正态所导致的系统误差。之后,在显变量中介模型基础上,通过 SPSS24.0 的 Process3.3 插件来进行 Johnson-Neyman(J-N)调节效应分析。由于模型过于复杂,Process 插件中无相对应的模型选项,笔者遂自定义了 Process 插件下的对应语法。为了降低生性问题,自定义模型分析时采用了 Cribari-Net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HCSE)的参数估计方法(Hayes and Cai,2007)。由于本模型包含双重调节效应,笔者通过 Matlab 2021a 软件,采用多项式曲面拟合技术(Polynomial Curved Surface Fitting,PCSF)进行双调节变量作用下被调节路径的三维可视化呈现。

(三) 变量与测量

① 因变量:政府评价。“您认为政府在以下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涉及医疗、教育、法治、就业、环境等 14 个维度指标。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 4 个等级,很不好=1,不太好=2,比较好=3,很好=4。本研究将政府评价作连续化处理,对 14 个维度的因子进行加和计算总分后进行分析。该部分测量题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7。

② 自变量:个体生活。本项研究基于工具可行性的考虑,选取受访者所面临的各类生活问题作为自变量,即询问受访者:“在过去 12 个月中,您或您家庭是否遇到下列哪些生活方面的问题?”涉及住房问题、子女教育、犯罪侵害、环境污染等 12 个维度,答案为二分类选项设置,即否=0,是=1。在建立中介与调节模型时,本研究作连续化处理,对 12 道题项进行加和计算总分后带入检验过程。该部分测量题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8。

③ 中介变量 a:社会信任。“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 分表示非常信任。”

④ 中介变量 b:社会道德感。“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上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好,10 分表示非常好。”

⑤ 中介变量 c:社会公平感。“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

正情况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公平,10分表示非常公平。”

⑥ 中介变量 d:社会安全感。“您觉得当前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状况如何?”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4个等级,即很不安全=1,不太安全=2,比较安全=3,很安全=4。

⑦ 调节变量 a:受教育程度。通过询问受访者“您的最终学历是什么?”进行测量。该题项的答案为: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含中专与职高技校)=4,大学专科=5,大学本科=6,研究生=7。

⑧ 调节变量 b:经济地位感知。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进行测量。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即下=1,中下=2,中=3,中上=4,上=5。

⑨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 CSS 中涉及的人口学变量作为分析模型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5项:性别(男=0;女=1)、婚姻状况(不稳定=0;稳定=1)、宗教信仰(无=0;有=1)、年龄、个人收入。

四、研究结果

(一) 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直接影响

表1显示的是政府评价在12种生活事件情境上的差异,因变量得分的组间均值差范围为1.08~3.59。从统计检验的结果来看,除物价上涨外,政府评价在其余生活状况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这11种负面生活状况均会导致政府评价的降低。其中,以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最严重,以人情世故问题的影响最轻微。此后,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运用 SEM 检验生活状况总分对政府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的种类越多,其对于政府的评价水平越低($\beta = -0.185, p < 0.001$),假设 H1 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支持。

表1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个体生活状况	组别	N	均值±标准差	组间均值差	t 值	显著性
住房问题	无	5811	43.08±6.96	1.32	6.53	***
	有	1671	41.76±8.34			
子女教育	否	5617	43.12±7.14	1.35	6.91	**
	是	1865	41.78±7.73			
抚养子女	否	5797	43.11±7.14	1.41	6.99	**
	是	1685	41.70±7.79			
家庭关系	否	7226	42.85±7.25	1.70	3.67	**
	是	256	41.14±8.68			
医疗支出	否	5389	43.15±7.00	1.30	6.95	***
	是	2093	41.85±8.00			

续表						
个体生活状况	组别	N	均值±标准差	组间均值差	t 值	显著性
物价上涨	否	4071	43.53±7.00	1.62	9.61	0.304
	是	3411	41.91±7.58			
家庭收入	否	4701	43.27±6.81	1.28	7.37	***
	是	2781	41.98±8.03			
失业问题	否	5558	43.13±6.98	1.32	6.84	***
	是	1924	41.81±8.13			
赡养老人	否	6543	43.05±7.13	2.07	8.16	***
	是	939	40.98±8.24			
人情世故	否	5957	43.01±7.12	1.08	5.14	***
	是	1525	41.93±7.95			
犯罪侵害	否	7281	42.88±7.27	3.41	6.55	***
	是	201	39.47±7.95			
环境污染	否	6682	43.17±7.10	3.59	13.29	***
	是	800	39.58±8.23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

(二) 社会心态指标的中介机制

(1) 基于显变量的假设检验。图 2 显示以标准化系数代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中介模型的所有路径系数均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符合理论建构层面的路径关系方向(正或负面影响),4 项社会心态显变量在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影响中起着权重较高的中介作用,假设 H2 和 H3 均得到支持。整个中介模型的 R^2 值达到了 0.433,即解释了结果变量 43.3% 的变化率,较“个体生活—政府评价”单一影响模型解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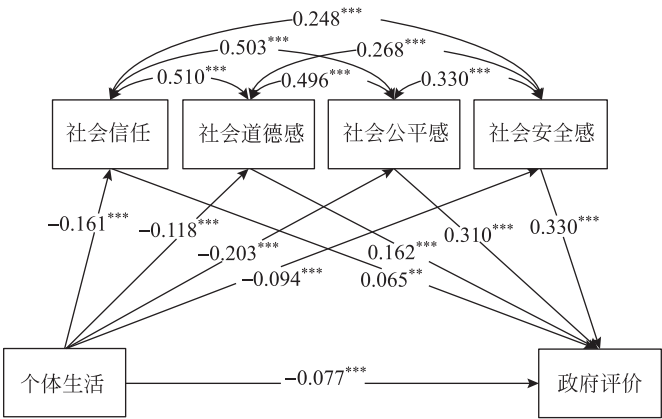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显变量的 SEM 标准化分析结果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控制变量的影响路径未予以标记。

(0.049)相比提升了近 7.84 倍,由此表明本研究所构建中介模型的解释效果较为理想。

(2) 基于潜变量的假设检验^①。为保证本部分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同时遵循 CSS 调查项目中的变量指标体系,笔者对各潜在变量的测量模型均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依据 SEM 分析的一般理想标准(Bagozzi, 1981),保留因子载荷大于 0.6 的全部题项。最终,政府评价保持了原有的 14 道题目,社会安全感涵盖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劳动、环境 6 方面,社会公平感涵盖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财富及收入、社会保障、城乡差异 7 方面,社会信任涵盖个体对于群团组织、慈善机构、新闻媒体、医院、法院、公安 6 种结构型主体的信任^②。图 3 显示以标准化系数代表的分析结果^③。4 项社会心态潜变量的中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意义,各路径系数均与研究假设的影响方向相一致,个体生活对于政府评价的直接影响($\beta = -0.181, p < 0.001$)被完全中介。以政府评价为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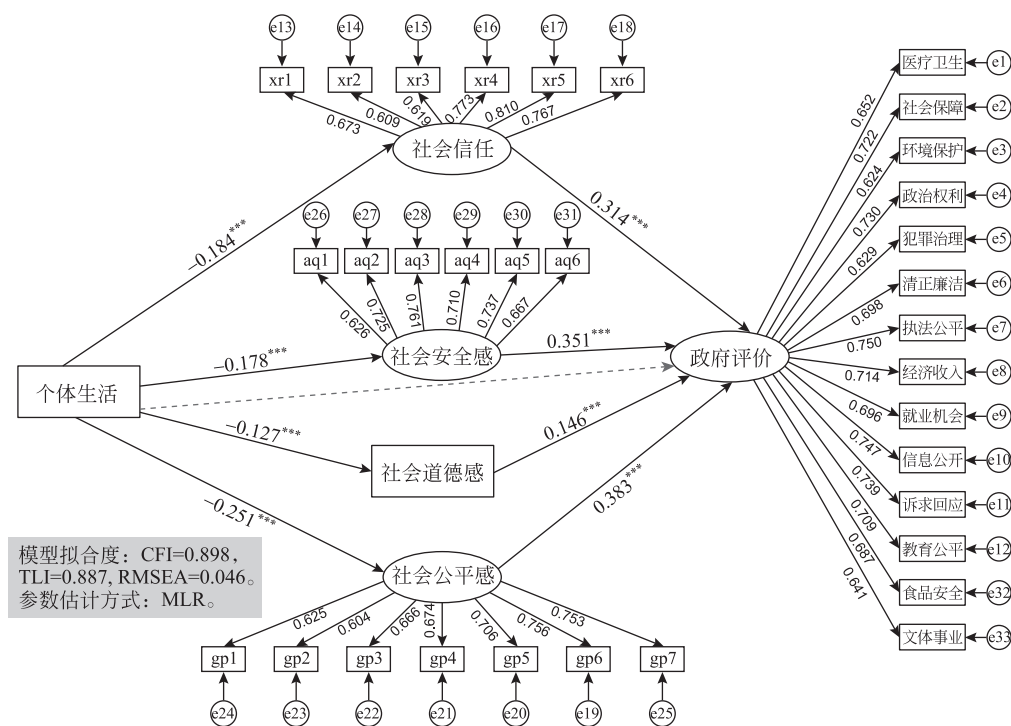


图 3 基于潜变量的 SEM 标准化分析结果

注: $N=577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控制变量的影响路径未予以标记。

- ① 利用潜变量进行中介模型的二度假设检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核心假设模型的内部效度。这也是在本文重点突出社会心态弥散性、整体性特征之基础上,针对特定领域心态元素所进行的一种延展性佐证。
- ② 为降低模型内生性,社会信任的测量指标剔除了与因变量具有高度共线性的政府信任题项。
- ③ 由于社会道德感在 CSS 调查项目中为独立题目,因此在本部分模型分析中对其仍保持前述单一指标的显变量测量方式。

变量的 R^2 值为 0.433,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力较为理想,模型拟合度为 $CFI=0.898$ 、 $TLI=0.887$ 、 $RMSEA=0.046$,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情况较为良好。

(3) 特定间接效应分析。对两组模型中所涉及的特定间接效应值与置信区间进行估计,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详见表 2。可以看到,所有特定间接效应值均具有统计显著意义,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由此可知,个体生活经由 4 项社会心态元素影响政府评价的传导过程具有极高的现实映照力。

表 2 特定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结果

模型路径	标准化 估计值	标准 误差	95%置信区间		双尾 显著性	
			下限	上限		
显变量模型						
总效应	-0.201	0.019	-0.237	-0.162	***	
总间接效应	-0.123	0.012	-0.147	-0.100	**	
特定间接效应 1:个体生活→社会信任→ 政府评价	-0.010	0.004	-0.018	-0.004	***	
特定间接效应 2:个体生活→社会道德感→ 政府评价	-0.019	0.004	-0.028	-0.011	***	
特定间接效应 3:个体生活→社会公平感→ 政府评价	-0.063	0.007	-0.077	-0.050	***	
特定间接效应 4:个体生活→社会安全感→ 政府评价	-0.031	0.006	-0.044	-0.019	***	
潜变量模型						
总效应	-0.211	0.017	-0.243	-0.176	***	
总间接效应	-0.235	0.015	-0.264	-0.206	***	
特定间接效应 1:个体生活→社会信任→ 政府评价	-0.058	0.006	-0.070	-0.046	***	
特定间接效应 2:个体生活→社会道德感→ 政府评价	-0.019	0.003	-0.025	-0.013	***	
特定间接效应 3:个体生活→社会公平感→ 政府评价	-0.096	0.008	-0.112	-0.082	***	
特定间接效应 4:个体生活→社会安全感→ 政府评价	-0.062	0.006	-0.075	-0.051	***	

注: * = $p<0.05$, ** = $p<0.01$, *** = $p<0.001$ 。

(三)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自定义 Process 模型中所涉及的所有路径关系如图 4 所示。其中, X 表示个体生

活; $M_1 \sim M_4$ 分别表示社会信任、社会道德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 W 表示受教育程度; Z 表示经济地位感知; XW 表示个体生活与受教育程度的乘积项; XZ 表示个体生活与经济地位感知的乘积项; $M_i W$ 表示单一中介变量与受教育程度的乘积项; $M_i Z$ 表示单一中介变量与经济地位感知的乘积项; Y_i 表示特定路径被调节之下的政府评价;其余字母均为路径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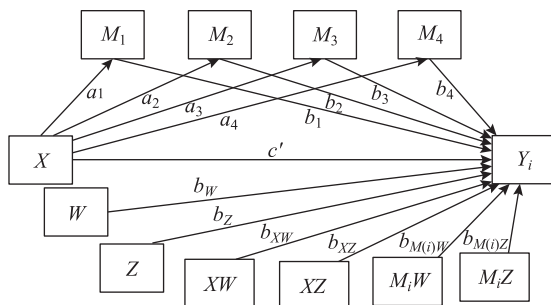


图 4 本研究的自定义 Process 模型示意

自定义 Process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仅呈现所有交互项对政府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存在受教育程度($B=-0.067, p<0.01$)与经济地位感知($B=0.100, p<0.01$)的双重调节作用,假设 H4a 得到全面支持。社会信任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存在受教育程度($B=-0.104, p<0.01$)的单一调节作用,社会公平感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存在受教育程度($B=0.140, p<0.001$)的单一调节作用,假设 H4b 得到部分支持。

表 3 交互项对政府评价的影响结果

交互项	标准化 系数	标准 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作用机理	作用形式
				下限	上限		
XW : 个体生活× 受教育程度	-0.067	0.023	**	-0.111	-0.022	强化	双重调节
XZ : 个体生活× 经济地位感知	0.100	0.034	**	0.034	0.167	缓释	
$M_1 W$: 社会信任× 受教育程度	-0.104	0.035	**	-0.173	-0.035	缓释	单一调节
$M_1 Z$: 社会信任× 经济地位感知	0.056	0.050	0.266	-0.043	0.155	无	
$M_2 W$: 社会道德感× 受教育程度	0.021	0.040	0.604	-0.058	0.100	无	无
$M_2 Z$: 社会道德感× 经济地位感知	0.099	0.062	0.107	-0.022	0.220		

续表							
交互项	标准化 系数	标准 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作用机理	作用形式
				下限	上限		
M ₃ W:社会公平感× 受教育程度	0.140	0.039	***	0.063	0.217	强化	单一调节
M ₃ Z:社会公平感× 经济地位感知	-0.066	0.055	0.228	-0.174	0.042	无	
M ₄ W:社会安全感× 受教育程度	0.013	0.127	0.916	-0.236	0.263	无	无
M ₄ Z:社会安全感× 经济地位感知	0.037	0.192	0.847	-0.339	0.413	无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

由于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感知对“个体生活→政府评价”的调节作用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意义,因此需要通过三维成像效果以呈现双调节变量共同作用下的路径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上下曲面分别代表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的拟合曲面,中间网格面则代表双调节变量共同作用下路径效应值的拟合面。结果显示,在三维空间中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感知的右下较大部分区域内,上下曲面与效应值为 0 的平面均不发生交汇,即置信区间不包含 0,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感知对该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个体生活→政府评价”路径的负向影响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经济地位感知的降低而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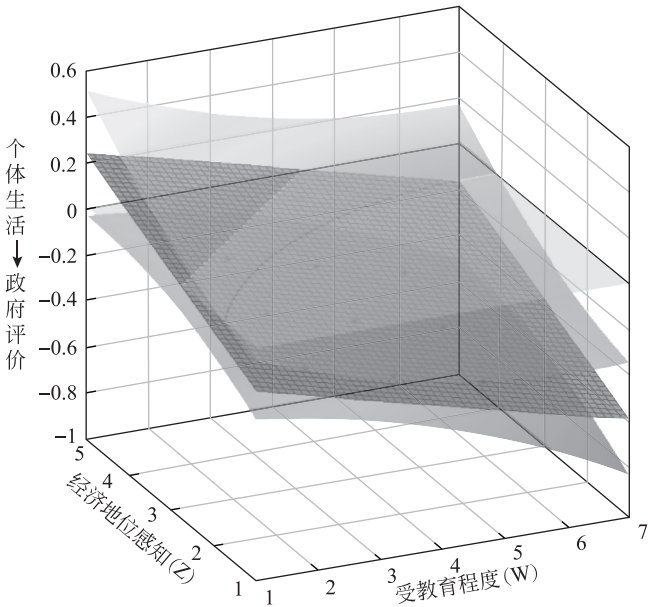


图 5 主客观社会阶层的双重调节作用

图6呈现了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政府评价”路径的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下限在受教育程度取值为4.475时与X轴交汇,因此当取值大于4.475时,受教育程度显著调节社会信任与政府评价的关系,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影响效应值相继减小0.094。图7呈现了受教育程度对“社会公平感→政府评价”路径的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上限与下限与X轴均无交点,因此在取值的全域范围内,受教育程度显著调节社会公平感与政府评价的关系,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影响效应值相继增大0.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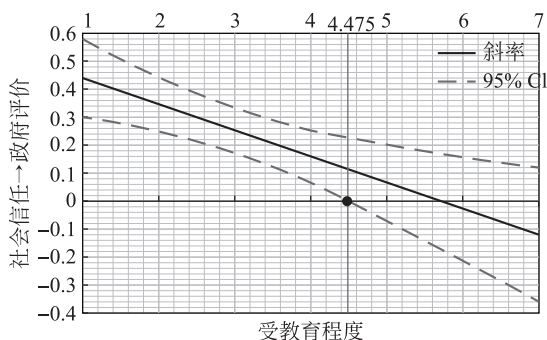


图6 “社会信任→政府评价”路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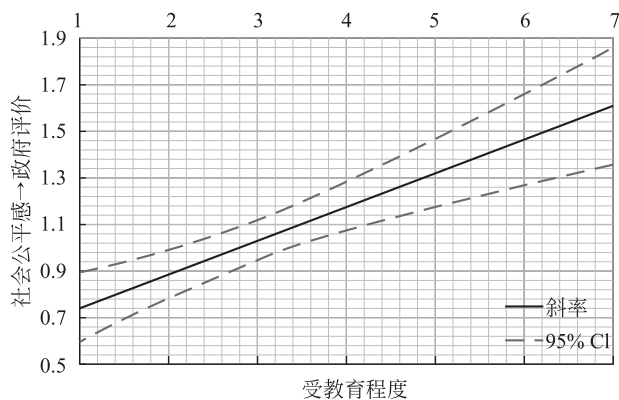


图7 “社会公平感→政府评价”路径调节效应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样本期数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选取CSS 2019、CSS 2017、CSS 2015三期数据分别对中介模型及其调节效应进行验证^①,分析方法与假设检验部分保持一致。表4为中介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情况。可以看到,三组模型中的个体生活与社会心态均对政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且各路径的影响力方向与研究假

^① CSS2019和CSS2015并不包含“社会安全感”的相关调查题项,因此相应年份稳健性检验中的部分结果仅涉及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社会道德感3项社会心态指标。

设相一致。同时,社会心态的内部变量彼此间也具备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知,中介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中介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社会心态				政府评价
	社会信任	社会道德感	社会公平感	社会安全感	
模型一(CSS 2019, $N=7408$)					
个体生活	-0.141 ^{***} (0.011)	-0.129 ^{***} (0.011)	-0.167 ^{***} (0.011)	—	-0.064 ^{***} (0.011)
社会信任	—	—	—	—	0.099 ^{***} (0.013)
社会道德感	0.497 ^{***}	—	—	—	0.167 ^{***} (0.014)
社会公平感	0.477 ^{***}	0.537 ^{***}	—	—	0.308 ^{***} (0.013)
模型二(CSS 2017, $N=6912$)					
个体生活	-0.117 ^{***} (0.012)	-0.124 ^{***} (0.012)	-0.188 ^{***} (0.012)	-0.082 ^{***} (0.012)	-0.087 ^{***} (0.011)
社会信任	—	—	—	—	0.094 ^{***} (0.013)
社会道德感	0.511 ^{***}	—	—	—	0.164 ^{***} (0.013)
社会公平感	0.285 ^{***}	0.322 ^{***}	—	—	0.245 ^{***} (0.012)
社会安全感	0.208 ^{***}	0.261 ^{***}	0.302 ^{***}	—	0.153 ^{***} (0.011)
模型三(CSS 2015, $N=6814$)					
个体生活	-0.150 ^{***} (0.012)	-0.138 ^{***} (0.012)	-0.172 ^{***} (0.012)	—	-0.091 ^{***} (0.011)
社会信任	—	—	—	—	0.119 ^{***} (0.013)
社会道德感	0.476 ^{***}	—	—	—	0.225 ^{***} (0.013)
社会公平感	0.302 ^{***}	0.334 ^{***}	—	—	0.332 ^{***} (0.011)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社会心态变量间的数值为相关系数。

表5为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情况,仅呈现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的交互项变量。可以看到,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时期数据的中介模型中均普遍存在。在模型一的5组调节作用中,受教育程度对“个体生活→政府评价”路径、“社会信任→政府评价”路径以及“社会公平感→政府评价”路径的作用机理与CSS 2021数据库结果相一致。在模型二中,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均起到了社会心态对于政府评价影响力的强化效应。而在模型三中,仅经济地位感知起到了对于“社会公平感→政府评价”路径的强化效应。由此可知,社会阶层调节作用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5 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交互项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作用机理	作用形式
			下限	上限		
模型一(CSS 2019,N=7408)						
XW:个体生活× 受教育程度	-0.062 **	0.023	-0.108	-0.016	强化	单一调节
M ₁ W:社会信任× 受教育程度	-0.089 **	0.033	-0.153	-0.023	缓释	单一调节
M ₂ W:社会道德感× 受教育程度	0.079 *	0.037	0.006	0.151	强化	单一调节
M ₃ W:社会公平感× 受教育程度	0.121 ***	0.036	0.051	0.190	强化	双重调节
M ₃ Z:社会公平感× 经济地位感知	0.111 *	0.047	0.019	0.203	强化	
模型二(CSS 2017,N=6912)						
M ₁ Z:社会信任× 经济地位感知	0.123 *	0.052	0.020	0.225	强化	单一调节
M ₂ W:社会道德感× 受教育程度	0.107 **	0.038	0.033	0.181	强化	单一调节
模型三(CSS 2015,N=6814)						
M ₃ Z:社会公平感× 经济地位感知	-0.242 *	0.120	-0.478	-0.006	强化	单一调节

注: * = $p<0.05$, ** = $p<0.01$, *** = $p<0.001$ 。

五、结论与讨论

(一) 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个体生活在总体上对政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且其中

11 种具体的负面生活事件均会降低政府评价水平。事实上,人们在社会参与过程中遭受的普遍紧张情绪可以被概括为 3 类:因受阻碍而无法实现目标的“求而不得型”紧张、积极价值被移除的“痛失所爱型”紧张,以及长期忍受负向刺激的“挥之不去型”紧张。3 类紧张都会增加不安、焦虑、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体验,而后降低人们采取合理手段缓解压力的可能性,使个体会倾向于利用抱怨、敌对、谩骂等偏离常态的方式来寻求释放。因此,当面对房价过高、子女教育抚养和赡养老人成本过大的生活境遇时,求而不得的“无力感”会在个体心境中迅速蔓延开来,以致发展为对政府在经济市场调控、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工作的主观苛责;犯罪事件遭遇、失业状况发生、家庭关系破裂等会使人们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计划被迫发生转折,这种重大变故会令个体失去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力量,诱发严重的“剥夺感”,继而滋生关于政府在社会风险防控、社会和谐维系等方面工作欠缺的联想;收入偏低、居住环境不佳、疾病缠身及人情世故的牵绊无疑构成了对于居民而言的持续性阵痛,此类生活压力长期存续且无法消弭;而当“绝望感”积聚到一定程度,个体内心的抱怨倾向便会外显于负有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提供、社会文化引导职责的政府之上。值得注意的是,物价上涨对政府评价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方面的成绩,表明物价监测预警、价格标准完善、市场节奏营造等微观层面举措,以及扩大内需、供求关系优化、对外贸易把控等宏观层面政策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风险抵御效能。于民众而言,可尝试利用认知转移、情感平衡等内在应对策略,以及社会互动、社会资源调取等外在应对方式,来弱化因不同类型压力所产生的剥夺感、无力感与绝望感。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在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前提之下,应考虑将重点置于环境保护与犯罪预防方面,通过改善乡村环境、改造社区设施、增设警务站、召开警民交流会等具体措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个体生活压力对政府评价的直接转化效应,避免积羽成舟、群轻折轴,用个体客观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为基于社会心态的社会治理开展铺设前置轨道。

(二) 社会心态的多重中介机制

本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社会道德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均分别起着“上行反映”与“下行释放”的影响效果。虽然社会心态的部分指标变量对于政府评价的影响已被零散化地证实,但这种“港汊纵横”、各抒己见的状况,可能会导致学界对某些基本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变得扑朔迷离,也容易使我们对社会本质的把握变得愈发困难。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本研究所构建的“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对政府评价因素的作用顺序、影响权重、预测角度等方面均给予了充分的考量。我们应辩证地理解个体生活与社会心态的关系,既要看到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或动力时的个体心理波动情况,又要关注“自然人”依附社会纽带的被动性,重视个体心理能动地外化于社会认知的过程,挖掘其对于社会心态的培育功能,警惕其对于社会心态的侵蚀风险。当稳定的社会心态被塑造形成后,个体通过调动系统内部资源、平衡系

统元素关系的方式对结构主体进行再认识、再判断的过程,则属于一种应对方式层面的自我调适,对其原理的把握是政府行为在转型时期所无法忽视的聚量心理资源与场域稳态要件(王俊秀等,2023b)。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社会-政府”中介模型的多重机制中,社会公平感与社会安全感路径的共同影响力达到了社会信任与社会道德感路径系数之和的3倍以上。这表明,相较于强调主观“表达性”色彩的社会信任与社会道德而言,民众对于能够折射公权力主体“功能性”内核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的期待是更为敏感的。该发现可以结合归因理论的观点来做进一步理解。“功能性”心态元素契合了外归因路径的本质属性,当社会运转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安全—公平”秩序时,个体便会容易将持续性、不可控的生活失范状态归因于外部结构主体的不作为。这一外归因过程折射出民众对政府职责授权的追认,并反向激活了其在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以及公平正义、良法善治追求层面的“心理账户”。相应地,“表达性”心态元素则锚定了个体信息加工的内归因节点,使民众在面对负向事件时倾向于认为是自身行为所致,常表现为采取“道德推脱”与“信任重构”策略以获得宽慰。作为我国的行政主体,政府及其各部门既肩负着社会治理、法律执行、犯罪打击、秩序维护等衍生自职业定位和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实然导向”职责,又承担着民众体验所赋予的提升社会幸福感、社会包容度、社会和谐度等“应然导向”职责(许博洋等,2022)。如果弥散于社会中的犯罪恐惧感、不稳定情绪居高不下,或是公职人员在行政管理或执法过程中暴露出较多的非公理性,那么生活状况会更易通过指向功能导向归因的心态路径将负向情绪传导至政府。

因此,不同政府部门应重点关注二元职责导向所起到的差异化社会心态成效,合理体现政府工作与公众满意之间的契合性。为实现这一目标,犯罪治理主体应当强化对具有“普适性体验”或“深度共识”特征的犯罪现象的防控力度,例如严防极端暴力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以及引起较大范围公私财产或社会秩序损耗的剥夺式犯罪(危害食品安全、贪污受贿等),加大对于侵害民生权益类案件(电信诈骗、盗窃等)中退赃、退赔效果的执行与监督力度,并尝试在涉舆型犯罪的官方通报中增加“说理”成分,于初查、立案阶段构建“案情—查证—说理”机制,以法律条文涵摄逻辑,明晰特定行为人“是否涉嫌犯罪”“涉嫌何种罪名”“因何涉嫌犯罪”,以及“为何不涉嫌舆情表达中的他种罪名”等民众关切的内容,以降低不必要猜忌而引发的恐惧感,于源头遏制网络谣言的编造及传播,实现社会安全感的系统性提升。就社会公平感的提升而言,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须弱化对于“民生小案”的行政处罚力度,纠偏“锦标赛”思维,查处由其引发的短视行为,对于轻微违法(摆摊经营、违章停车、寻衅滋事等)采取警告、教育等柔性治理手段,最大程度降低对个体生活的硬性干扰,在法律适用精准的前提下积极选择自由裁量范围的下限区间,做到“可罚可不罚的不罚,可重可轻罚的轻罚”(许博洋,2024)。另一方面,司法统计部门须推进“司法透明度”建设,优化“裁判文书网”与“司法案例库”的统计衔接机制,以城市为

单位完善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与司法程序的公开数据登统、查询模式,补充并细化诉讼类型比例、案件增长率等统计指标,定期发布热点行政争议案件的处理情况,并联合政府宣传主体与网络媒介平台通过“直播问政”等形式鼓励民众参与讨论并表达意见。鉴于“道德—信任”社会心态元素的内归因属性,二者的构建路径则更加需要调动广大群众的共治参与意愿来实现。个体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进行意见表达时应自觉抵制性别对立、民族仇恨、地域歧视等戾气言论,摒弃“低级红”和“二极管”思维。当然,政府与网络平台须辅助勾勒以中华文化普适价值为节点的道德、信任图示,形成以和为贵与兼容并包的主流舆论导向,以社会宽容度的有序提升来激励社会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的自主净化。

(三) 社会阶层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具有明显的主客观差异。首先,受教育程度会放大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负向影响,但经济地位感知会降低个体生活对政府评价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更易觉察到生活状况改变与政府行为间的关系,且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会使其倾向于通过外部归因的方式理解日益增加的结构型压力。相比之下,经济地位感知较高的居民,在面对负面事件或危害结果时,会因更多的社会支持或社会资本削减内心的消极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资源足以应对当下的消极生活遭遇,从而迅速填平剥夺感、无力感与绝望感,减缓了政府部门负向评价的积累速度。其次,受教育程度会削弱社会信任对政府评价的正向影响。低学历群体会不自觉地放大其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加工,而高学历群体因其社会化进程的相对滞后,在人际互动中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距离及较强的独立性倾向(杨熹等,2020)。社会信任在低学历群体中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表现为客观社会阶层对政府评价的“缓释”效应。最后,受教育程度会提升社会公平感对政府评价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高学历人群在捕捉社会公正对权威主体的影响方面更为敏锐(杨林川等,2017),且他们会更为全面地加工相关信息,从而更加关注运行程序上的公平情况(Trope and Liberman,2010)。

鉴于阶层分化效应在政府评价生成中的实质性作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落实与政府职能履行应当注意治理方式的对象区分性,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开展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本文发现,政府部门应密切关注拥有高学历但处于较低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的境遇,在前述多元化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的基础上,积极扩容大学生、研究生就业岗位,并保证身份自洽性与职业认可度,用制度手段保障利益分配、诉求表达、矛盾协调,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入度与获得感,减少地域、社群中的对立型话语结构,削弱带有偏见色彩的“标签效应”。

六、结语

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本文建构的“个体-社会-政府”理论框架为中国

公共管理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丰富贡献了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价值。研究结论启示政府须把握社会心态各种指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并密切关注不同阶层民众生活需求的满足状况,关注其作为社会心态“晴雨表”指针的意涵,引导和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在各场域的社会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修正、创新公共管理的社会心态实现路径,形成行政活动与社会治理并行的共同体意识,其之于政府主体的好感度、好评率自然会随之上行。作为实证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局限。其一,本文使用的变量题目是基于CSS调查项目的设置而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结论外部效应受损。学界可尝试基于多维度量表对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并将假设模型引入至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部门场景中,以丰富基于社会心态的社会治理范式的现实改革方案;其二,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本土化理论框架,但受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开放程度、媒介氛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省份、市县、乡镇中的居民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差异,因此,笔者期待更多学者在以地区为组别的异质性分析中对模型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参考文献

- 陈刚,李树. 2012.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8): 55-67.
- Chen G, Li S. 2012. How can the government make people happy? —A cas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quality on residents' feeling of happines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8): 55-67. (in Chinese)
- 陈伟,吴晓刚. 2020. 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J]. 开放时代, (6): 162-180.
- Chen W, Wu X G. 2020. Housing price rise and urban residents'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J]. *Open Times*, (6): 162-180. (in Chinese)
- 邓明,仇勇. 2018. 环境污染如何影响了居民的政府信任?——基于“中国式分权”视角的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3): 78-95.
- Deng M, Qiu Y. 2018. How do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fect Chinese resi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Style Decentralization” [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 78-95. (in Chinese)
- 范柏乃,金洁. 2016.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10): 50-61.
- Fan B N, Jin J. 2016.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on perceive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imag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0): 50-61. (in Chinese)
- 何哲. 2023. 公共治理:道德为什么是重要的?——兼论政府在公共道德治理中的作用[J]. 公共治理研究, 35(2): 24-34.
- He Z. 2023. Public governance: Why is morality important? —Also discoursing the

- government role in public moral governance[J]. *Public Governance Research*, 35(2): 24-34. (in Chinese)
-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J]. *心理科学*, 37(6): 1509-1517.
- Hu X Y, Li J, Lu X Z, et al. 2014.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6): 1509-1517. (in Chinese)
- 洛克. 2016.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瞿菊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Locke J. 2016.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 吕书鹏. 2015. 差序政府信任: 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学海*, (4): 148-157.
- Lü S P. 2015. Hierarchical political trust: Concept, status and causes[J]. *Academia Bimestris*, (4): 148-157. (in Chinese)
- 裴志军, 陶思佳. 2018. 谁会给政府“差评”: 社会资本和生活满意度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1): 98-103.
- Pei Z J, Tao S J. 2018. Who would give the government bad review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 government evaluation[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98-103. (in Chinese)
- 瞿小敏, 郁姣姣, 于宜民. 2021. 社会态度、政府信任与不同类型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92-115, 270-271.
- Qu X M, Yu J J, Yu Y M. 2021. Social attitudes'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groups[J].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 92-115, 270-271. (in Chinese)
- 芮国强, 宋典. 2015.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为中介变量[J]. *南京社会科学*, (2): 82-89.
- Rui G Q, Song D. 201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vernment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Citizen satisfaction as mediated variable[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 82-89. (in Chinese)
- 王俊秀. 2014.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9(1): 104-124, 244.
- Wang J X. 2014. Social mental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societ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9(1): 104-124, 244. (in Chinese)
- 王俊秀, 等. 2023a. 社会心理建设: 社会心态培育的路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ng J X, et al. 2023a.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athways to cultivating social mentality[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王俊秀,等. 2023b. 社会心理建设:社会场域治理的路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ng J X, et al. 2023b.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athways to governance in social domains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王晓莹,罗教讲. 2016. 生活境遇与政府工作满意度——基于对 CSS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 107-111.
- Wang X Y, Luo J J. 2016. Living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 job satisfactio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SS2013 data[J].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1): 107-111. (in Chinese)
- 魏万青. 2016. 经济绩效、价值认同、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感[J]. 社会学评论, 4(1): 22-33.
- Wei W Q. 2016. Economic performance, recognition of valu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4(1): 22-33. (in Chinese)
- 吴结兵,李勇,张玉婷. 2016. 差序政府信任:文化心理与制度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6(5): 157-169.
- Wu J B, Li Y, Zhang Y T. 2016. The origin of hierarchical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6(5): 157-169. (in Chinese)
- 许博洋,张纯琍. 2022. 被害经历对我国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影响——基于道德感与家庭信任的双重调节模型[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4): 1-12.
- Xu B Y, Zhang C L. 2022. The influence of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on the sense of public security of Chinese residents—Double adjustment model based on moral sense and family trust[J]. *Journal of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8(4): 1-12. (in Chinese)
- 许博洋,周由,孙懿贤. 2022.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52-64.
- Xu B Y, Zhou Y, Sun Y X. 2022.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models and police trust in China—A multiple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52-64. (in Chinese)
- 许博洋. 2024. 犯罪治理如何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跨层模型分析[J]. 中国法律评论, (6): 42-62.
- Xu B Y. 2024. Crime governance affects people's trust in justice—A cross-level modelling analysis based on national samples[J]. *China Law Review*, (6): 42-62. (in Chinese)
- 杨昉,董妍,张登浩. 2020. 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与一般信任:社会排斥与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5): 975-980.
- Yang J, Dong Y, Zhang D H. 2020. Social class and generalized trust among Chinese

- adults: Serial mediating effect of ostracism and control[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8(5): 975-980. (in Chinese)
- 杨林川, 马红宇, 姜海, 等. 2017. 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J]. *心理学报*, 49(7): 980-994.
- Yang L C, Ma H Y, Jiang H, et al. 2017. When d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justice interact to influence legitimacy of authorit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lass[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7): 980-994. (in Chinese)
- 杨宜音. 2006.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 *社会学研究*, (4): 117-131.
- Yang Y Y. 2006. The psychological 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concept of social mentality[J]. *Sociological Studies*, (4): 117-131. (in Chinese)
- 张波. 2023.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关系论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1): 46-55, 159.
- Zhang B. 2023.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J]. *Studies on Marxism*, (11): 46-55, 159. (in Chinese)
- 张成福. 2023. 论政府治理现代化[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12(1): 3-18.
- Zhang C F. 2023. On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12(1): 3-18. (in Chinese)
- 张会芸. 2017. 当社会信任遇见政府信任——西方实证研究成果跟踪[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4): 77-84.
- Zhang H Y. 2017. When social trust meets political trust: Tracing new empir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1(4): 77-84. (in Chinese)
- 张书维, 李纾. 2018.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 内容、方法与趋势[J]. *公共行政评论*, 11(1): 7-36, 219.
- Zhang S W, Li S. 2018. Exploring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tent, method and trend[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1(1): 7-36, 219. (in Chinese)
- 张友浪, 朱旭峰. 2020. 公民接触与政府服务评价: 基于“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的证据[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5): 4-13, 124.
- Zhang Y L, Zhu X F. 2020. Citizen contact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services: Evidence from one-stop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s[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5): 4-13, 124. (in Chinese)
- 赵建国, 于晓宇. 2017. 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 2010 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8(3): 76-84, 109.
- Zhao J G, Yu X Y. 2017. Influence of social fairness on government trust: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0[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8(3): 76-

- 84, 109. (in Chinese)
- 郑姗姗, 王浦劬. 2022. 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相关关系实证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9): 117-125.
- Zheng S S, Wang P Q. 2022.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trust[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9): 117-125. (in Chinese)
- Bagozzi R P.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 comment[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3): 375-381.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 Hatfield E, Cacioppo J T, Rapson R L. 1993. Emotional contag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es A F, Cai L. 2007. Using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 estimators in OLS regression: An introduction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4): 709-722.
- Jost J T,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M]//Fiske S T, Gilbert D, Lindzey G.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1122-1165.
- Kelley H H, Michela J L. 1980.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1(1): 457-501.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et al.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J].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 Nunn N, Wantchekon L.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3221-3252.
- Oliver R L. 1980.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7(4): 460-469.
- Sidanius J, van Laar C, Levin S, et al. 2003. Social hierarchy maintenance and assortment into social roles: A social dominance perspective [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6(4): 333-352.
- Trope Y, Liberman N. 2010.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440-463.
- Weiner B. 1985.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92(4): 548-573.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Public: The Multiple Social Mentality Mechanisms Affecting Government Evaluations

XU Boyang¹ ZHOU You² WANG Junxiu³

(1.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Monash University;

3.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actions are increasingly evaluated not only by objective policy outcomes but also by the public's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ultiple mechanisms by which social mentality affects public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a triadic “individual-socie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 emphasizing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ways linking individual life conditions to government evaluations via one's social mentality.

Drawing on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CSS),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proposed model. Social mentality is conceptualiz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nsisting of four core dimensions: social trust, social morality,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security. These dimensions capture both the expressive and the instrumental components of societal functioning, and they are hypothesized to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life conditions on how people evaluat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reveal two primary mechanisms: an “upward reflecting” pathway, whereby positive life experiences enhance the social mentality elements; and a “downward releasing” pathway, whereby the individuals' concerns about social trust, social morality,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security shape public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The instrumental dimensions—namely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security—demonstrate stronger mediating effects than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s that are composed of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morality, suggesting that citize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equity and safety when evaluating government legitimacy. Moreover, social class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s may either amplify or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ntality on government evaluation. Specifically, those individuals in lower subjective social strata are more responsive to issues of justice and security, whereas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how more stable, less emotionally driven patterns of evaluation.

By unveil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mechanisms linking personal well-being to institutional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underscores the critical role of 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olicymakers to design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at not only improve material conditions but also actively cultivate social cohesion, fairness,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sum,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by offering a dynam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evaluative logic and reinforcing the importance of on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government evaluation; social mentality; individual life; social class; social governance

投稿日期: 2024/8/23 送外审日期: 2024/8/30 首轮外审完成日期: 2024/9/12
录用日期: 2024/12/13 最终修回日期: 2025/6/2